

世界哲學家叢書

山鹿素行

劉梅琴 著

傅偉勳 / 韋政通 主編

東大圖書公司 印行



世界哲學家叢書

山 鹿 素 行

劉 梅 琴 著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山鹿素行／劉梅琴著 -- 初版 --

臺北市：東大出版；三民總經銷，民79

面； 公分 -- (世界哲學家叢書)

參考書目 面163-170

含索引

ISBN 957-19-0102-4 (精裝)

ISBN 957-19-0103-2 (平裝)

1. 山鹿素行—學識—哲學

131.61

© 山 鹿 素 行

著 者 劉梅琴

發行人 劉仲文

出版者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二樓

郵撥／〇一〇七一七五十一號

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三月

編號 E13004

基本定價 叁元叁角叁分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九七號



ISBN 957-19-0103-2

《世界哲學家叢書》總序

本叢書的出版計劃原先出於三民書局董事長劉振強先生多年來的構想，曾先向政通提出，並希望我們兩人共同負責主編工作。一九八四年二月底，偉勳應邀訪問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三月中旬順道來臺，即與政通拜訪劉先生，在三民書局二樓辦公室商談有關叢書出版的初步計劃。我們十分贊同劉先生的構想，認為此套叢書（預計百冊以上）如能順利完成，當是學術文化出版事業的一大創舉與突破，也就當場答應劉先生的誠懇邀請，共同擔任叢書主編。兩人私下也為叢書的計劃討論多次，擬定了「撰稿細則」，以求各書可循的統一規格，尤其在內容上特別要求各書必須包括（1）原哲學思想家的生平；（2）時代背景與社會環境；（3）思想傳承與改造；（4）思想特徵及其獨創性；（5）歷史地位；（6）對後世的影響（包括歷代對他的評價），以及（7）思想的現代意義。

作為叢書主編，我們都了解到，以目前極有限的財源、人力與時間，要去完成多達三、四百冊的大規模而齊全的叢書，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光就人力一點來說，少數教授學者由於個人的某些困難（如筆債太多之類），不克參加；因此我們曾對較有餘力的簽約作者，暗示過繼續邀請他們多撰一兩本書的可能性。遺憾

2 山 鹿 素 行

的是，此刻在政治上整個中國仍然處於「一分為二」的艱苦狀態，加上馬列教條的種種限制，我們不可能邀請大陸學者參與撰寫工作。不過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獲得八十位以上海內外的學者精英全力支持，包括臺灣、香港、新加坡、澳洲、美國、西德與加拿大七個地區；難得的是，更包括了日本與大韓民國好多位名流學者加入叢書作者的陣容，增加不少叢書的國際光彩。韓國的國際退溪學會也在定期月刊《退溪學界消息》鄭重推薦叢書兩次，我們藉此機會表示謝意。

原則上，本叢書應該包括古今中外所有著名的哲學思想家，但是除了財源問題之外也有人才不足的實際困難。就西方哲學來說，一大半作者的專長與興趣都集中在現代哲學部門，反映着我們在近代哲學的專門人才不太充足。再就東方哲學而言，印度哲學部門很難找到適當的專家與作者；至於貫穿整個亞洲思想文化的佛教部門，在中、韓兩國的佛教思想家方面雖有十位左右的作者參加，日本佛教與印度佛教方面却仍近乎空白。人才與作者最多的是在儒家思想家這個部門，包括中、韓、日三國的儒學發展在內，最能令人滿意。總之，我們尋找叢書作者所遭遇到的這些困難，對於我們有一學術研究的重要啓示（或不如說是警號）：我們在印度思想、日本佛教以及西方哲學方面至今仍無高度的研究成果，我們必須早日設法彌補這些方面的人才缺失，以便提高我們的學術水平。相比之下，鄰邦日本一百多年來已造就了東西方哲學幾乎每一部門的專家學者，足資借鏡，有待我們迎頭趕上。

以儒、道、佛三家為主的中國哲學，可以說是傳統中國思想與文化的本有根基，有待我們經過一番批判的繼承與創造的發

展，重新提高它在世界哲學應有的地位。為了解決此一時代課題，我們實有必要重新比較中國哲學與（包括西方與日、韓、印等東方國家在內的）外國哲學的優劣長短，從中設法開闢一條合乎未來中國所需求的哲學理路。我們衷心盼望，本叢書將有助於讀者對此時代課題的深切關注與反思，且有助於中外哲學之間更進一步的交流與會通。

最後，我們應該強調，中國目前雖仍處於「一分為二」的政治局面，但是海峽兩岸的每一知識份子都應具有「文化中國」的共識共認，為了祖國傳統思想與文化的繼往開來承擔一份責任，這也是我們主編《世界哲學家叢書》的一大旨趣。

傅偉勳 韋政通

一九八六年五月四日

序

筆者於研究生時，曾與外子王祥齡先生合作發表〈儒家對德川時代的功能影響及其功能〉（《鵝湖月刊》第98號）。由此漸進，開始對日本江戶時代之歷史思潮之動盪與人物思想家之興起產生莫大的好奇與不懈的求知欲。

試觀一八四二年中國鴉片戰爭之後，以及一八八六年日本「大政奉還」，中、日在被迫接受西潮的百年來，兩國情勢之逆轉有如轉倒之倒覆、日月之交位。而山鹿素行在其《中朝事實》一書中所倡導之「日本中華主義」，筆者以為，此雖為對「華夷論」之反動與翻版，及其對日本文化本土自覺意識之表現。然而在歷史思潮「下剋上」之風潮下，其影響與結果顯示，又不得不以「華」自居之中國人感到汗顏。試想中國二千年來以種族、地域、文化差異來劃分之華夷思想，如今是否已面臨了實質上崩潰之危機與瓦解之命運呢？

筆者不才，誠然不敢為中日關係與未來發展之方向與結果驟下斷語。然深信「鑑古觀今」為明瞭其間深妙變化之途。又以為，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之成就實奠基於德川時代二、三百年間文化思想教育之變革與推廣。故試擇《山鹿素行》為探究之先端。

憶及《山鹿素行》一書之寫作，實脫胎於三年前之碩士論文

2 山 鹿 素 行

——〈山鹿素行の日本中朝主義について〉。而當時全憑外子王祥齡先生之指導與鼓勵，而此書之成，全仰仗傅偉勳教授之提攜與引薦。感激之心，無以言盡。

民國78年12月25日

記於外雙溪故宮

山 鹿 素 行

——「日本中華主義」與「華夷論」

目 次

《世界哲學家叢書》總序

序

前 言

第一章 德川時代儒教之勃興與思想界潮

流概述 5

第一節 時代之課題..... 5

第二節 近世儒教之興起與影響..... 9

第三節 近世儒教之變貌.....17

第二章 素行之求學過程與思想變革.....25

第一節 素行武士之身分與其思想內容.....25

第二節 素行的求學時代.....34

第三節 三教一致思想.....48

第四節 朱子中心思想.....58

第五節 中華聖學思想.....73

第六節 日本聖學思想.....84

第七節 原源發機..... 108

第三章 「日本中華主義」在日本思想史	
上之代表意義	123
第一節 佛家神道	128
第二節 儒家神道	134
第三節 國學神道	141
第四章 結論——「日本中華主義」與「華夷論」	149
參考書目	163
人名索引	171
書名索引	173
術語索引	177

前 言

山鹿素行爲德川時代開創武士道學派，山鹿流兵學以及古學、日本中華主義之始祖。《聖教要錄》爲其復古精神之先聲，其中提倡恢復中華聖人——周公、孔子之道，並言孔子歿，聖人之統盡絕，極力駁斥宋學爲異端，因此與幕府之官學（朱子學）相牴觸而獲罪，遭受流放赤穗之命運，並言「夫罪我者，罪周公孔子之道也，我可罪而道不可罪，罪聖人之道者，時世之誤也」，自比周公、孔子。卻在赤穗流謫中完成了其一生最有名，並改變日本思想史之著作《中朝事實》，以形式上而言，《中朝事實》爲研究日本古典歷史之著作，全以漢文書寫，不過與《聖教要錄》比較，其旨趣卻大相逕庭，兩者雖同是復古精神之表現，但崇拜的對象卻由對中華聖人之崇拜，轉向爲對日本神聖之崇拜。故而提倡誇耀日本精神之「日本中華主義」，認爲「中華（指日本）之文物，與天地參，非萬邦可並比」，所以日本當稱爲「中華」、「中朝」、「中國」而非「夷人之東夷」，故寫《中朝事實》而證明其「日本中華主義」，而此一主義，可說是與「華夷論」相對抗之思想，亦即日本主義與中華主義之對抗。因此之故，日本思想史上長久以來之中華崇拜就此改觀了。以至後世，排斥中華思想者亦不乏其人，甚有以日本爲世界之中心，欲征服

2 山 鹿 素 行

世界必先征服中華之主張，因此，我們可說「日本中華主義」爲日本脫離中華思想束縛之先端，因此一改以往之中華崇拜而爲崇拜日本之日本迷了，戴季陶《日本論》頁四末云：

日本人迷信他們的國家，是世界無比的國家，他們的皇室，是世界無比的統治者，他們的民族，是世界優秀的「神選民族」，這種思想，都從神教的信仰產生出來的，其實也不過是宗法社會裏面崇敬祖宗的道理。（中略）德川氏承續豐臣氏的霸權以後，政治文物，燦然大備。傳入日本千餘年的印度中國的思想，已經和日本人的生活，融成一片。於是日本民族自尊的思想，遂勃然發生。有一個有名的學者，叫做山鹿素行，在這民族自尊心的鼓盪裏面，創起一個日本古學派。這一個日本古學派之學術的內容，完全是中國的學問，並且標榜他的學問，是直承孔子，對於中國儒家的學說，連曾子以下，都不認為滿意。對於漢唐宋諸家，尤其對於宋儒，更抨擊無遺，以為宋儒的思想，是破壞孔子之道的異端。但是他卻借了中國的學問來造成日本民族的中心思想，我們看他的著作，就曉得在方法上、理論上，都沒有一點不從中國學問得來，沒有一處不推崇孔子之道，而精神卻絕對兩樣。他是鼓吹「神造國家」、「君主神權」。山鹿氏所著《中朝事實》一本書裏面，把他的思想根據，也就發揮盡致了。

由上所述可知，日本迷是由日本宗教信仰神道之中而來，而其自尊心之興起則於德川三百年間成立，山鹿素行便是有名之代表，

而筆者以爲之所以如此，除了受儒家影響以及華夷思想之刺激外，一方面也是神道思想之鼓動所激盪而成。無疑的，此一「日本中華主義」爲日本思想史開創了獨立之新機運，而原本居日本思想界之領導地位之中華思想，從此也就一落千丈而爲日本思想所支配了。

了解乎此，不難想像今日「日本第一」之原動力竟源乎於此「日本中華主義」，雖其不過爲「華夷論」之另一種翻版，但觀乎今日中、日兩國地位之逆轉，自忖對於將來關係之演變將該有所惕勵了。

若回顧中日兩千年來之交流，不難發現在文化上之交流多屬「一方通行」（單行道）之傾向。日本不斷之輸入，學習中華文化，而中國人卻對日本缺乏具體之體驗，依戴氏之說則爲中國人「自大思想」所導致，以及因「思想上閉關自守」、「智識上的義和團」所誤而不願認識日本，想其唯東夷之小島國耳，要不就是因「同祖同源論」，一廂情願的認爲日本與中國乃「同文同種」之兄弟之邦，殊不知此華夷思想中天下一家以華爲祖宗，夷狄爲末枝之說法早在德川時代便被質疑並否定之。試想，何以此說會被推翻，除了前述因德川時代受儒學影響、華夷論刺激、民族自覺以及神道思想與國學思想興盛外，特別的是此「同祖同源論」僅爲華夷思想中之一理論觀念，從未如其他南蠻、西戎、北狄一樣，與中國大陸連接，長期進行文化交流外，亦同時進行種族間之融合同化作用，是以依華夷思想中三種基本要件種族、文化、地域之別的情況下，日本在種族、地域上始終是獨立的，而文化方面則在千年薰陶下模倣「華」，而欲如「華」而取代之。是以從中華思想與日本思想之關係發展上看來，一方面可知華夷

4 山 鹿 素 行

思想爲始作俑者，而日本思想「崇佛而斥佛」、「尊儒而排儒」，也就是繼所謂南北朝以來下層階級凌越上層階級的「下剋上」風潮之後，日本文化思想對中華思想「下剋上」之表現，以心態言之則又爲強烈自卑感所引發超強的自尊心。

是以，本書論述之宗旨便以山鹿素行《中朝事實》之「日本中華主義」爲出發點，試圖說明其思想之本質與中日思想之關連與影響。

第一章 德川時代儒教之勃興與思想界潮流概述

第一節 時代之課題

德川家康於 1603 年（慶長三年）任命為征夷大將軍，繼承了織田信長、豐臣秀吉之偉業，而於江戶開創幕府，直到 1867 年「大政奉還」止，凡二百六十餘年，而此德川氏封建政權之二百餘年便為日本史上所謂的德川時代或是江戶時代，而依歷史時代之區分則屬於近世時期。此一時期結束了自 1192 年以來所引發的「武」之爭伐，結束了百年戰國的黑暗時代而為「文藝復興」時期，中世武家連年的殺伐，以及「應仁之亂」^①所導致的天下大亂、社會秩序崩潰，政治權威喪失殆盡、人心渙散。原本慰撫人心、安定人們精神力量之宗教——佛教亦在此「黑暗時代」面臨了戰國時代新興武士對佛教思想及佛教之指導地位提出了反面之質疑。和辻哲郎氏在其《日本倫理思想史》下卷中便做了以下之說明：

① 「應仁之亂」自西元 1467-1568 年信長入京，或 1573 年室町滅亡。

6 山 鹿 素 行

此空之哲學，（中略）六道輪迴、淨土往生之思想，在戰國時代，其影響力薄弱，甚且對其產生出反動之立場，新興之武士們已不同鎌倉時代之武士們怖畏地獄之責苦。因而釀成對來世報應「大笑」置之之態度。此則反應了新興武士們之間排除迷信之態度之表現^②。

而新興武士之代表織田信長更針對佛教僧侶之墮落加以攻擊^③，是以佛教地位之轉落，除了「空的思想」、「六道輪迴」、「往生淨土」等思想之不合實際現實社會需要外，僧侶們之墮落亦是使佛教地位一蹶不振之原因。隨著「武」的爭伐所帶來的社會秩序瓦解，政治權威崩潰與信仰之低迷等因素導致了日本文化史上「下剋上」^④之風潮。即使家康貴為天下之霸主，仍然不可免於陷於「下剋上」的危機之中。因此如何斷絕「下剋上」之風潮，如何轉換戰國殺伐之人心就成了德川家康所面臨之時代的課題。對家康自身來說也是確保其支配者之地位，完成治國平天下之大業前所最需首先解決之題。關於「下剋上」之終結，在《日本思想史概論》中便有一段簡潔之描述，其云：

如何終結下剋上亦是戰國武將掌握的政治要訣。（中略）

② 和辻哲郎著，《日本倫理思想史》下卷，頁 350。

③ 同②，頁 345：「信長首先語及佛教僧侶之墮落」，以及頁 352：「只要關於道義，信長不斷的攻擊佛僧之墮落……」

④ 相良亨等編著，《日本思想史の基礎知識》，頁 217：「『下剋上』一詞出自陰陽，鎌倉末期始頻出於文獻中，（中略）事實上欲追求實利，接近權利之人們之行動，不僅威脅到支配者，時而反叛集團一致之行動。」

家康靠主從情誼的結合之力，終於收天下之霸權於掌中。

（中略）穩固二百五十年來德川氏的支配基礎，下剋上使自將軍始錄倉以來之名家沒落，但因秀吉大受阻止，因三河武士情誼的結合之力打下了終止符。再建的武士社會、統一的日本，再畫然而為上下的身分秩序的社會^⑤。

以上說明了至家康，下剋上便做了一終結，重新建立武士社會、統一的日本以及上下身分秩序的社會。至於家康是如何轉換戰國以來的殺伐之氣、終止下剋上之風潮，應歸功於其採取「偃武修文」之治。這一點似乎是避了元朝以馬上取天下以馬上治天下之後塵，而以宋朝的文治為本，然而不同的是，趙匡胤取得天下之後便杯酒釋兵權，解除武將之兵權而產生重文輕武之後遺症，而德川時代的武士們卻在「偃武修文」的政策下，一方面肯定其武士之職位，一方面使其接受文治教育，如此一來非但改變了武士殺伐之氣習，也為德川政權奠定了穩定之基礎。而德川時代之武士教育便成為後世主導日本歷史發展最大之原動力，其影響不可不謂深遠。

而關於德川家康以馬上取天下而不以馬上治天下之事，據《德川實紀》記載：

雖全以馬上得天下，然生來神聖之質，久知不可以馬上治之之理。常尊聖賢之道，斷言凡治天下國家，惟行人所以為入之道。此外別無他途，治世之始，屢助文道，因之世

⑤ 石田一良編，《日本思想史概論》，頁 162-163。